

地史
書
業
精
算
圖

古西行記

選 注

西北史地资料丛书

古西行记

选 注

杨建新主编

1754

宁夏人民出版社

古西行记选注

杨建新等 编注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0 字数：400千 插页：1

198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11157·51

定 价：3.95元

《西北史地资料丛书》弁言

翁独健

西北五省（区）面积占全国三分之一，据黄河、长江之上源，自古以来为华夏诸族文明之发祥地，多民族蕃衍生息汇合交融之舞台，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之通道，凡有志于研究中国史地学者，披览典籍，莫不关系西北一隅。但《隋书》、《旧唐书》等经籍艺文志著录有关史传地志行记，为数不多，宋元明各代，专著稍增，亦均散佚过半，降及清代乾隆以后，西北史地之撰作辑佚，记今考古，始大行于世，徐松、龚自珍等先后倡留心边陲之学风，遂奠定西北专门之学之基础，自兹以还，此学时有升沉。清末国势衰颓，外国势力渗入西北，考察山川，搜讨文献者接踵而来，饱载而去，有识之士，时时为之扼腕叹息。三十年代，关心邦国之乡贤学者或辑录史志或实地考察，抗日战争起，多士来居关中陇右，

2182-421

以故一时调查西北后方实况，蔚然成风，而陕西北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之根据地，自此出发遂能光复故土，解放全国。解放三十五年来，西北教育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学人研究乡土故实，著述日多，西北史地之学又值一复兴之机。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五省（区）出版社遂于1984年决定协作出版《西北史地资料丛书》，以汇集、整理自古代迄清记录西北历史地理之典籍，兼及组织翻译国外有关著述为己任，使学者有研讨之资，省寻觅之力，这确实是一件大好事。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西北。1983年中央决定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国家建设重点转移到西北。近十几年来是倾注大力做开发前的准备工作阶段。在物质准备之外，人才培育与科学调查实为当务之急。西北史地的研究与知识的普及既是培育热爱西北、献身开拓的英才所必需，又是调查西北自然社会现状的凭借，因此，《西北史地资料丛书》的出版不仅适时，而且其重要意义又超越于裨益专门学术领域之外了。

此一丛书的选编校注出版的牵头单位为宁夏人民出版社，受编辑同志再三命嘱，聊作弁言数语如上。

一九八四年十月

前 言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中原地区的官员、学者、僧侣等，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来往于我国西北地区（主要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内蒙古西部），并把他们的见闻记录下来，或由别人代他们记录下来，流传于后世，我们把这类体裁和内容的著作、文录和札记等，称为西行记。

古代行记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这些涉及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古代行记，数量不多，得来不易，又往往因其非当时显宦、名将、大儒所著，所以多附录于别书，印本很少。解放前后虽已有一些著名的西行记被刊印成册，但发行量很少，而且由于长期靠传抄留世，所以讹讹甚多，寻找和阅读均非易事，对西北史地的研究者和爱好者，甚为不便。我们选注这部以记载西北边疆地区史地情况为主要内容的西行资料集，就是想为关心西北史地的读者提供一些方便。

古西行记在我国史科学中，占有一种特殊地位。这是因为它所记述的地区，在我国历史发展中，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地区。这里，民族众多，民族政权林立，一些民族的活动，对

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曾有过重大的影响。这里又是古代中西交往的咽喉，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主要组成部分，曾经是中西文化交流、荟萃之区，也是国内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荟萃的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一个渊藪。这里，古代民族迁徙频繁，政权更迭迅速，交通运输不便，大多数地区长期以游牧经济为主，这种情况又使这个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基础脆弱，发展极不平衡，时而大起，时而大落，使它的社会历史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

西北地区历史上的这些特点，既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内容，也为历史研究者提出了许多难以解开的谜。要解开这些谜，仅靠传统的所谓“正史”，是十分不够的。我国所谓“正史”及其他历史文献虽然内容十分完备，数量十分庞大，但多把西北边疆地区和在这里生息、活动的少数民族，或作为“四裔”、“藩属”，仅以少量笔墨加以简略记述，或干脆排斥于外，致使史料十分稀缺。这就为了解和研究我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解开西北地区历史中的许多谜，带来了很大困难。而古西行记，由于它们的作者，大多是各时代亲历其境、亲闻其事的见证人，他们的记述，无疑为我们研究西北地区丰富而又难解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正史”和其他文献的有关记载，多所补漏匡谬。因此，这些西行记，对丰富我国历史研究的内容，开阔人们的眼界，解开西北历史、地理研究中的迷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古西行记不仅是了解和研究当时西北地区社会、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而且就其本身来说，也都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对

象，因为它本身就有着十分丰富的研究课题和研究价值。例如，这些著作中提到的地名、民族部落名，以及一部分当地历史事件，由于没有其他记载可以直接印证，很多都是“独家新闻”，在我们今天来看，就很难说清楚。就以地名来说，西北地区许多地名多以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命名，随着民族迁徙、变动，地名也随之有新的变化。不同时代的行记，虽所经地区和路线一致，而所记地名却有较大差别，使人们在阅读这些著作时，不仅难以比定历史上某地是今天何地，而且对历史上地名的变化以及地名变化所反映的历史事件，也有许多解释不清之处。所有这些，都使得这些西行记本身，很早就成了学者们研究、考证的重要对象。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有的西行记进行过考订、校注，有的注释文字甚至超过原书的许多倍。但是，至今对一些疑难问题仍然众说纷纭，得不出一个公认的结论。本书将这些西行记辑于一册，也许会有益于对这些问题进一步开展比较研究和讨论，有益于问题的解决。

本书所选西行记，就其起讫年代来说，上自西周，下至清代，但中间所缺亦不少。如两汉、三国、魏、西晋时期，虽然来往于西北边疆与中原地区者不少，却未留下记述其西行的单独著录；有些人的西行记，如张骞的《出关志》、班超的《西域风土记》等，也只保留下书名，而原著早已散佚。

就本书所收西行记的体裁、风格来说，也不尽相同，其中有的是旅行者自己所写，有的是他人根据旅行者的口述、笔录和有关资料整理而成，有的是日记形式，有的则采综合叙述。在选编方法上，有的选用全篇，有的则只节录其有关段落。行

记涉及的地域范围，除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及其他有关地区外，也包括了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一些有关地区。

本书所收集的西行记中，有一部分是解放后和近几年已有印本的。如东晋时期高僧法显的《佛国记》、记述唐代高僧西行求法的《大唐西域记》、蒙元时期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耶律楚材的《西游录》等，这些著作都是学术界所瞩目的名著，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其进行过深入研究，有的在国内已有了比较完善的校注本。但为了本书的完整性，为了方便读者查阅以及便于读者和研究者将这些著作和其他西行记互相对照，进行比较研究，我们仍然将其全部或将其一部分收入本书。

本书还选辑了这样一些著作，如《穆天子传》、贾耽的《四夷路程》、陈诚的《西域蕃国志》等。前者虽是行记性的著作，但对其所记内容的真伪有不同看法：一些研究者认为这部书是神话和古代传说，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它确是周穆王西行的真实记录。但不管怎样，我们认为它终究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以记述游历我国西北地区为主要内容的著作。因此，不论它是真实的历史记述，还是文学作品、神话传说，对研究我国西北地区的交通、地理、历史还是有意义的，收入这部著作，会使本资料集的内容更加完整和丰富。贾耽的《四夷路程》一类著作，虽然不是作者亲自西行的记录，但它是根据当时到过周边地区的人们的叙述和记录写成的。这类著作无疑对了解和研究当时其他西行记，也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们也将其有关部分收入本书内。至于《西域蕃国志》一类著作，虽不是行记体裁，

但它是陈诚、李暹等人出使西域时，对所见、所闻诸国情况的真实记录，是他们的《西域行程记》的姊妹篇，也是这部西行记的注释性、补充性著作，对了解《西域行程记》，了解和研究陈诚等西行的路线、沿途情况，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因此，它也应属本书必收之列。

本书的任务，主要是把这些分散的、饶有趣味而且极有学术价值的西行记汇集起来，方便读者，并引起更多的人对我国西北地区历史、地理的兴趣，激发人们热爱西北、开发西北的热情。因此为了更能适应多方面读者的需要，我们对这些西行记，在前人校注成果的基础上，作了必要的校注。目前已出的一些西行记的校注本，旁征博引，考证细密，显示出了作者的深厚功力。但是也毋庸讳言，许多注释多以甲西行记注释乙西行记，又以乙西行记注释甲西行记；或借题发挥，离题太远，考证烦琐，反而使读者感到冗长、繁杂，不得要领。另外，就当前的学术条件来说，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解放前后许多学者的努力，一些西行记中的问题，如地名、事件、年代等，大多已有定论，且载于各种工具书中，没有必要不加选择地收入注中，更没有必要作烦琐考证。有见于此，所以本书为各西行记所作注释，力求简明扼要。如必欲追寻考证渊源，亦可根据本书所提供的线索，查阅各家注释。原文中括号内的内容如在简介及注释中未加说明者，均为本书编者所加。

本书所收古西行记，只是西行记中的一部分，还有一些西行记，由于本书篇幅所限，未能收入，有待以后补辑或单独印行。

由于我们的水平不高，见闻不广，条件有限，辑注不妥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参加本书辑注和其他工作的还有：马曼丽、樊保良、王希隆、江波、张凤英等同志。

杨建新

一九八五年元月

目 录

前 言	1
穆天子传 (节录)	1
法显传 (节录)	27
宋云行记	41
大唐西域记 (节录)	62
往五天竺国传 (节录)	107
悟空入竺记	120
杜环经行记	130
贾耽四道记 (节录)	138
高居诲使于阗记	148
西州使程记	156
青唐录	166
西游录 (节录)	174
长春真人西游记 (节录)	186
北使记	231
西使记	237
河源记	251

西域行程记	260
西域番国志	260
西征日录	298
扈从纪程	316
据鞍录	326
伊犁日记	355
天山客话	355
万里行程记	383
东归日记	419
荷戈纪程	433
莎车行纪	462
西行日记 (节录)	493
滇中行纪	533
地名索引	567

《穆天子传》及其作者简介

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人不准，盗发战国魏襄王（公元前318—前296年）墓，得竹简数十车，其中有“《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晋书》五十一卷束皙传）。晋武帝将这些简册送秘阁由荀勖、和峤以及束皙等人“校缀次第，寻考指归”。原简为古文，当时已不能尽识，经过识辨，用隶书抄出，遂使该书流传于世。晋人所整理之书，曾用过两种名称，一称《周王游行记》，一称即为《穆天子传》。原为五卷，后以美人盛姬死事一卷缀于书尾，遂成六卷，即为至今所存由荀勖作序、郭璞作注的《穆天子传》。

自《穆天子传》一书出土以来，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特别是近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者颇多。讨论的问题，就其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是关于书的真伪问题。这个问题有两层意思，一是关于《穆天子传》成书时间的早晚，二是《穆天子传》内容的真伪。

关于《穆天子传》成书的时间，清人姚际恒著《古今伪书考》将其列入伪书，以为从其体例和内容来看，与《山海经》、《竹书纪年》多有相符之处，应是汉代及其以后之人所著。但

汲冢确为战国时墓葬，所出简册中，有《穆天子传》一书，历史记载十分明确，仅从体例和与其他后来著作相似一点，并不能说明此书是汉以后的伪作。所以，姚氏之说虽曾盛行一时，却未能得到公认。另一种看法，也是大多数学者的看法，认为此书最迟是战国时的著作，而且很可能是，或者有一部分是当时史官的真实记录。

至于《穆天子传》是历史记载还是小说创作，则更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一种看法认为，《穆天子传》成书虽在先秦，但不过是小说家之作，内容全系杜撰，特别是清代钦定《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小说家类，成为清代官方的正统看法；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以当时人记当时事，都是真实记录，凿凿信史，毋庸置疑。《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将其列入史部起居注类。也有人认为，其基本内容无可置疑，但也掺杂了不少道听途说、渲染夸大之词。

就《穆天子传》成书时间来说，应是先秦产物，似可无疑。但是，由于启墓时的毁损，古文抄录为今文时的缺误，以及后来流传、刻版过程中出现的失误、讹伪，都必然影响《穆天子传》的原貌。因此，现行《穆天子传》中也难免掺杂进一些渲染、夸大、道听途说、随心所欲之词。但是，周穆王西巡之事，历史记载还是清楚的。

穆天子即周穆王（约于公元前1001—前947年在位），是西周第五代国王，姬姓，名满，周昭王之子。继位时，年已五十，在位五十五年，则去世时当在百岁以上。《史记·周本纪》载，穆王继位时，“王道衰微，穆王阅文武之道缺，乃命

伯羿申滅太仆国之政作《羿命》，复宁”。据此，则穆王是周朝前期颇有作为的一位君主。对外，他曾远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至于周王西游之事，《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将皆使有车辙马迹焉。”此次“周行天下”是否就是远征犬戎，虽不得而知，但周穆王曾远出，则似无疑义。《竹书纪年》亦有“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的记载。可见，《穆天子传》所述穆王西行之事，并非全无根据。

因此，我们认为，对《穆天子传》一书的真伪及其性质，还是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从其出土情况及有关历史记载看，它的基本内容很可能是当时周穆王西行的真实记录。退一步说，如果它所记述的周穆王西巡之事基本上是杜撰的，是小说家之言，但是由于这部书所述行程至今仍可找到其线索，那么，这也说明，先秦时期，中原人对我国西北及其以西许多地方，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 and 了解。而这种认识 and 了解，正是当时中原与西北地区以及更远地区有一定来往、联系的证明，这对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历史地理，也是宝贵的。我们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将《穆天子传》收入本书的。

至于《穆天子传》所述穆天子西行路线，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不同解释。但大多数皆以古地名与今地名的对音为基础，来确定穆王的行程，其结果，反倒使穆王行程今日已在东，明日忽又在西，无法联成一线。大多数研究者，皆以为穆天子西行，是由洛阳出发，北行，经山西，至河套西行。也有认为从西安地区出发，经六盘山西行的。其西行最远之地，有谓在

中东两河流域的，有谓到达欧洲平原的，有谓在中亚地区的，有谓不出塔里木河流域的，有谓不出青海的，也有谓不出甘肃河西的，等等。

而其中研究比较细密、论述比较充分的，要算顾实先生。顾实为明末清初史地学家顾祖禹的后代，自幼秉承家传，注意于历史地理，对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探究更为精到，对《穆天子传》的研究，尤为潜心，积二十年之功，撰成《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一书，从各个角度对《穆天子传》前四卷，即西巡部分，作了很深入的研究。在今天看来，其中虽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但总的来说，此书在研究《穆天子传》的诸说中，仍不失为有一定代表性、有一定说服力的一家之言。

在研究《穆天子传》一书的诸说中，岑仲勉先生（1885—1961年）《“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一文（原载《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后收入《中外史地考证》），则代表了与顾实不同观点的另一派的研究成果。岑先生于西北史地研究，多有建树，故能以其渊博的学识，对《穆天子传》一书所记西行路线提出许多新看法，给《穆天子传》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本书对《穆天子传》的校注，主要采录了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和岑仲勉《“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的研究成果。他们两位的观点虽然距离很大，但对我们研究《穆天子传》都是很有价值的。至于众多校注家的观点，有些已为两位先生所吸收，有些似乎也无必要纳入本书。

《穆天子传》成书虽然很早，但遗憾的是，早期刻本已